

隴縣文史資料

第十一輯

中国民主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
陇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编



陇县文史資料選輯

第十一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陇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办公室编

政协陇县委员会文卫文史工作委员会

主任：王寿民

**委员：李宝刚 梁正齐 曹旭东 王建升
阎珍海 黎志贤 撒玉成**

《陇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编辑人员

编 审：李玉堂

责任编辑：崔振华 李宝刚 杨中祥

校 对：杨全福 赵建军

陇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

- 张仲实与周恩来二三事 张积玉 (2)
- 历史的回忆
——解放前我所经历的学生运动的几个片断
..... [葛世民] (11)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参加陇县解放及支前、建政工作的回忆片断
..... 郑作舟 (32)
- 斗争恶霸赵子杰大会纪实 王荣彬 (44)
- 解放初期陇县的剿匪及镇反运动
..... 撒天和 (51)
- 建国初取缔一贯道概况的回忆 马执中 (63)
- 省劳模赵德才与陇县第一个互助组 劲 草 (68)
- 廉洁刚直 默默奉献
——忆李仲义同志 [杨中祥] (72)

一九九四年十月
总第十一辑

目 录

- 明代学府千山书院 张纯良 (85)
陇县的职业技术教育 张宝乾 杨俊 (90)
忆我在陇中工作的后几年里 尚涤非 (102)
五十年代的陇县爱国卫生运动 孙心铭 (107)
陇县体育事业发展简况 李福魁 (114)
审时度势 创办实体
 ——水利系统开展综合经营纪实 马执中 (118)
关山老爷岭遇匪记 张国忠 (127)
轰动宝鸡山城的陇州社火
 ——陇县社火参加宝鸡市首届民间艺术节之经过
..... 安德福 冯万春 (133)
景福山游记 (二) 孙培元 (142)
谷神观丹阳洞药王洞的来历 胡百川 (146)
陇州弦蒲藪 张宝林 (150)
陇县道教的发展和演变 杨全福 (153)

按：

张仲实（1903—1987），陇县城关乡店子村人。

早于1925年在学生时代就投身大革命的洪流，担任中共渭北特支书记，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30年代初他从苏联留学回国后，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从事马列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工作，是著名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他一生在革命斗争中曾与周恩来多次有过交往，受到过热情关怀、教育和帮助，这些为促使他成为一个共产主义忠诚战士起了主要作用。下文只是作者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张仲实与周恩来交往的几件事。今后本书将对张仲实有关史料陆续介绍。

——编者

张仲实与周恩来二三事

张积玉

一、一次难忘的历史性会见

1937年10月上海沦陷后，张仲实随生活书店被迫向内地转移，于8月中旬到达汉口，不久即与刚刚获释的爱国七君子之一、“救国会”著名领袖邹韬奋会合，在武汉继续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周恩来同志作为中共代表被邀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职务，也在武汉领导我党国统区的地下活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张仲实到武汉后，很快便与驻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文委书记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并经他介绍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面见了董必武，和20年代在莫斯科有同窗之谊的博古、凯丰也取得了联系。张仲实每次从办事处回去后向邹韬奋谈到我党的指示精神，他总是认真听取，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且常常流露出面见负责同志的希望。于是张仲实先引荐他到八路军办

事处面见了董必武。听了董老的谈话，他思路大开，兴奋不已。在返回的路上郑重提出希望面见周恩来。张仲实虽过去见过周恩来，但此时尚未与他取得直接联系。他便把情况转告了凯丰，凯丰提出让他直接给周恩来写信。张仲实立即写了信，信中说道：“邹韬奋同志虽不是共产党员，但关于救国道路问题，他选定了中国共产党，他的政治态度跟党的主张没有分歧，并且总是诚恳地听取党的主张，努力使党的主张变为他自己的实践，他很感谢我党对‘生活书店’出版刊物的支持和帮助，希望能见到周恩来同志。”（张仲实：“言犹在耳，记忆仍新——对周恩来同志的回忆片断”，1985年1月8日《人民日报》）周恩来见到信后，很快同意面叙。

1938年9月的一个下午，张仲实陪同邹韬奋来到了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已如约等候在家，在详细问过邹韬奋出狱后的身体和生活情况后，周恩来给他们分析了抗日战争以来的政治形势，介绍了我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详细询问了生活书店的工作，今后的打算以及文化界的情况。他关切地说：“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你们二人都是知识分子，有知识，又很爱国，希望我们更密切地配合起来，团结更多的知

识翁重出一遭走完日救国的道路。”“现在我们抗日会
加勤奋并以御侮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将来我们抗日会
还要共同努力，以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救国，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社会
主义新中国，更少不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参加嘛。”对于国民党反动派迫害爱国知识分子的罪行，周恩来表现得怒不可遏，作了严厉的斥责。他们谈话无拘无束，持续了两个多钟头。临别时，周恩来还情深意切地说：“请你们记住，爱国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无论什么时候都需要。有什么要求，请随时提出来，我们共产党一定会尽可能地帮助解决。”邹韬奋希望周恩来方便时到生活书店指导工作，周恩来爽快地接受了这个请求。此后，邹韬奋对周恩来从心坎里敬仰不已，视以为“良师益友”。每有什么困难，即就是写书稿时评中的问题，也总是想到向周恩来请教，并向周恩来正式提出了入党要求。周恩来也在忙中常常关注着韬奋及生活书店，在武汉，周恩来曾到过生活书店门市部和编辑部看望职工，勉励他们为抗日救国多出力。在重庆，周恩来更是经常出现在生活书店管理处逐月举行的茶话会上，发表趣味风生的政治报告。这是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见，对于邹

韬奋来说，它成了他一生从爱国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重要转折；对于生活书店来说，此后更为直接的得到了周恩来同志的指导，走上了一条更加坚定正确的革命道路，成为抗战中一个坚强的文化堡垒。

二、一个重要的决定

1939年3月间，张仲实与茅盾一家应当时新疆学院院长杜重远之邀，辗转来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市），担任新疆学院政治经济系主任，兼教哲学、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并任新疆文化协会副秘书长。

到新疆后，他和茅盾很快便与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的负责同志毛泽民、陈潭秋等共产党员取得了联系，并频繁来往，经常在一起议论重要问题，分析形势。他们利用新疆学院的合法讲台，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当地的进步报刊《反帝战线》、《新芒》月刊、《新疆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理论著译和研究国际问题的评论文字，张仲实还出版了两本重要译著——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以及《新哲学读本》，据岩看、王华

轶的《抗战时期新疆的革命文化活动》一文讲：由于张仲实等的辛勤工作，“扩大了马列主义在新疆各族群众中的影响，当时的迪化形成了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的良好风尚。……有时人们为买一本畅销的马列主义书籍，甚至需要连夜排队。”

(详见1983年9月24日《新疆日报》)为促进新疆各族文化的发展，张仲实还参与主持举办了民族文化干部训练班，为学员亲自讲授马列主义理论，培训了来自新疆各地12个民族的200多名学员；为各族学生编写了急需的中小学教材；并组织开展了各项文艺宣传活动，特别是在赵丹、徐韬等著名艺术家到达后成立了新疆第一个专业剧团——实验剧团，编演了不少大型话剧，一时把新疆的文化生活搞得生气勃勃。这年8月，以杜重远为团长，张仲实、郭慎先(新疆学院教务长)为副团长的“新疆学院暑期工作团”，先后赴伊宁、绥定、惠远、精河、乌苏、呼图壁、独山子油矿等地，深入各族人民，广泛进行抗战宣传活动。他们每到一地，都召开群众大会，向各族人民发表豪情激昂的演说，宣讲抗战形势，开展社会调查，并表演文艺节目，深受欢迎。然而这一活动也引起了盛世才的忌恨，不久竟蓄意构陷所谓杜重远阴谋暴动案把杜重远软禁起来。这时，

张仲实与茅盾也已处境极为艰难，盛世才虽不敢明目张胆镇压，但暗地里经常派人跟踪盯梢。1939年8、9月以后，张仲实和茅盾等已处在虎口之中，时刻都有生命危险。1939年11月28日陈潭秋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写道：“新疆省情况近来未见改善，仍继续逆转”，“所谓阴谋暴动案正在审讯中……，说赵丹、徐韬、史枚、仲实、茅盾等均……参加杜的破坏活动。”1940年2月下旬的一天，张仲实正在茅盾家里，盛世才突然派人来要他单独去督办公署，茅盾回忆说：“这是很反常的，因为往常盛世才没有单独召见过仲实，都是我们俩人同去。而盛世才又常以谈话为名拘捕人犯”（《新疆风雨》下；《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张仲实到了督办公署，未被引到盛世才通常会客的西花厅，而被带到一间厢房，坐等了两个多小时才出来，为张仲实的久候表示歉意，请他帮助修改一份材料，张仲实仅用十几分钟就看了一遍，改了几个字，请副官送交盛世才。一会儿，副官回来说，请张先生回去。原来，盛世才请他来修改材料是借口，实则是想把他抓起来，所以让人带到厢房；后来又犹豫了，反复权衡了两小时，才借口修改材料把他放了。可见当时盛世才也已对张仲实、茅盾等伺

机准备下手。就在形势日益险恶的这一年9月间，周恩来乘着苏联医治摔伤的右臂，路过迪化，盛世才设宴招待，张仲实和茅盾被邀作陪。不久，去苏联治癒的毛澤民回到新疆，找张仲实谈话中说：“周恩来同志托我告诉你，你们可以去延安。”（张仲实：《我的简历》）听到这个消息，他为党牵挂关怀自己感到极大的安慰和振奋，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茅盾一家，并开始天天计划着如何逃出盛世才的魔掌。恰好1940年3月，老家来信说伯母去世，要他回去安葬（张仲实幼时丧母，由伯母抚养成人），盛世才不得不准假。不久，茅盾的母亲也去世，也向盛世才请了假。几经周折，直到5月，他们才在地下党负责同志的周密安排下，脱离虎口，到达延安。周恩来决定让张仲实、茅盾一家去延安，这给处于极端危险境地、无路可走的张仲实和茅盾一家指出了一条光明的道路，从而使他们逃离了封建军阀盛世才的魔掌，走上了新的革命坦途。

三、一封感人至深的亲笔信

1940年，张仲实离开新疆奔赴延安后，长时

间与老家失去了联系，家中老小只知他离开了新疆而不知其去向，怕其有不测，一直心中极为不安。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谈，国内政治形势有所缓和。1946年秋，张仲实的侄子、当时在陇县中学工作的张维新从报纸上看到中共代表团在南京，便冒昧给当时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询问叔父张仲实的下落。时隔不久，即收到了周恩来的亲笔回信。信是毛笔竖行写的：“来信收悉。令尊现在延安，如有信可寄我处代转。”落款为：周恩来。一封短信，使家人一颗久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得知亲人平安，欣慰异常。全家人对周恩来这位当时著名人物的关心感激不尽，以至长时间把周恩来信中的话铭记在心，至今虽原件佚失，但信的全部字句还能熟背出来。

在延安期间，张仲实在中宣部工作，并担任过马列学院编译部主任，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组组长等职，在周恩来等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1944年7月，杰出的共产主义文化战士邹韬奋逝世，周恩来曾安排张仲实代表党中央于9月中旬草拟了致韬奋家属的唁电。11月11日，延安召开韬奋先生追悼会发起人第一次会议，张仲实与周恩来、

吴玉章、博古、邓颖超、周扬等13人参加，周恩来指定张仲实负责治丧委员会的具体工作。他曾拟成《纪念邹韬奋先生办法》，经周恩来修改、补充，毛泽东批示“照此办理”。11月22日，延安各界二千余人集会追悼邹韬奋。吴玉章主祭，朱德、陈毅等讲了话，张仲实代表筹委会作报告，提议成立纪念委员会，经大会一致通过。周恩来、吴玉章、林伯渠、博古、陈毅、张仲实等为纪念委员会委员。（详见《韬奋与出版》，书林出版社；1944年11月24日《解放日报》头版）当时，延安《解放日报》还组织了纪念专刊，毛泽东、朱德为专刊题了词，张仲实写了长篇文章《一个优秀的中国人——韬奋的生平思想及事业》。周恩来在1949年韬奋逝世五周年时亦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

历史的回忆

——解放前我所经历的学生运动的几个片断

葛世民

我是陕西省陇县人，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学读书，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下，和同学们一起做过一些后方抗日宣传工作。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在前方畏敌如虎，节节败退，把大片河山拱手丢让。在后方贪污腐化，横征暴敛、抢粮拉兵，无恶不作。我的哥哥是一个农民，1939年被过路的国民党军队拉了壮丁，不到3个月就病死在行军途中。我的母亲因此事忧愤而死。这些国仇家恨，激发了我对国民党的仇恨和不满。但有救国之志，无报国之门，苦闷彷徨，不知如何是好。1941年，我在长安县上高中，参加和领导了一个有进步思想倾向的组织——“学友会”；几十个同学在会内经常讨论抗日的各种问题。当时学校设在秦岭山中，消息闭塞，校方控制文

严，找不到正确思想出路，也找不到党的领导，仍在苦闷中徘徊。1944年夏，我考入成都国立四川大学史地系。进校后就与同班同学地下党员冯玉钦相识（当时我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经常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势和国内抗日战争的问题，谈得很投机，使我对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搞独裁、闹分裂实质的认识有了新的提高。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日的胜利和周恩来在重庆同国民党斗争的各种消息不断传到我们中来，对我们鼓舞很大，使我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认识，更加向往共产党。当时成都有个《新华日报》分销部不仅出售《新华日报》，还出售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整风文献、“七大”文献等。还有一些古旧书店，也出租马列著作和各种不同派别的革命书籍。我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寻找救国救民道理。在冯玉钦同志指导下，我们共同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先后读了《共产党宣言》、《联共党史》、《资本论》、《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马恩列斯传略。学习了整风文献、“七大”文献，订阅《新华日报》和《群众月刊》（这是我党在白区办的两个公开刊物），对共产党和解放区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的立场发生了较大转